

文史通识教程

◎主编 丁富生



江苏省“十二五”中国语言文学重点专业类建设项目资助

文史通识教程

主编 丁富生

副主编 王育红

编委 (按汉语拼音音序排)

陈春保 崔荣华 范建华

邵志华 徐静玉 徐燕

张小芳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通识教程 / 丁富生主编.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305 - 15378 - 5

I. ①文… II. ①丁…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348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文史通识教程
主 编 丁富生
责任编辑 赵荣蔚 王抗战 编辑热线 025 - 83686531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89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5378 - 5
定 价 32.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文史的同源互根	1
第二节 文史的分合交织	3
第三节 文史的现代分科	9
第一章 明道载道	12
第一节 文道关系的历史阐释	12
第二节 文道兼美的价值意蕴	19
第二章 养心明志	33
第一节 文史因缘与心志“智慧”	33
第二节 文史互彰与心志样态	39
第三节 信仰、传统与养心明志	44
第三章 融通互证	52
第一节 文史名著融通的神采异貌	52
第二节 文史融通互证的基本方法	63
第三节 文史融通互证的一般路径	67
第四章 虚实相生	72
第一节 看朱成碧思纷纷	73
第二节 疏影横斜水清浅	77
第三节 华严楼阁弹指现	82



第五章 经世致用	87
第一节 美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88
第二节 资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95
第三节 教化: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100
第六章 知人论世	107
第一节 读书修身之途径	107
第二节 文学批评理论之构建	113
第三节 阅读欣赏之方法	117
第七章 求真求实	125
第一节 西方文史求真之路	125
第二节 中国文史求真之路	133
第三节 文史求真求实之别	139
第八章 至善至美	146
第一节 美与善的本质溯源	146
第二节 中西文化中的美善相乐	152
第三节 美善相乐的实践互动	157
附录 精读文选	164
离骚(节选)	164
荀子·乐论	169
项羽本纪(节选)	174
太史公自序(节选)	183
报任安书	186
刺世嫉邪赋	191
史通二则	193
三十自述	197
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	203
不朽——我的宗教	210
中国文化与文艺天地(节选)	217



“慢慢走，欣赏啊！”	220
维廉诗话三则	224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章节选)	230
诗艺(节选)	231
人格的世界	236
蓝色的还是带条的	249
后 记	252

绪 论

文史合一，由来尚矣。

一是脱胎于天地间大自然的人文混沌本源。远古的传说和神话为之作了最好的诠释，瞽史以其本能的记忆擅长成为最早的见证者，远古人类拓荒创业的成就，通过瞽史之口得以流传，“言”与“事”的相连融合，恰好披露出根源处浑然一体的精彩。“十口相传为古”，史迹之缘起罔不由是。传说和神话作为人类文化的土壤和母胎，再现了文史互根渊源的真实写照。

二是源发于人世间天人互动的终极关怀。拓荒时代的人类在与自然命运抗争的同时，既感激天地万物的自然厚赐，亦期望大地的风调雨顺，敬天祈神，占卜观象，伏羲始画八卦，仓颉初造书契，无不昭示着天人之间的互动。先祖奉天承运的鸿烈伟业，无不铭刻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羿射九日、神农试百草、大禹治水等故事成为文史互根中的永恒话题，而“伯禹腹鲧”、“玄鸟生商”、“姜嫄践迹”等传说，则演绎着上帝之命的眷顾及部族兴亡继存的根系所在。

三是出自于人类精神意识中文化交融的共同追求。来自不同时空的人类在生存和竞争中不断地碰撞，人类智慧在启蔽开合的互动中不断凝炼和升华，天人合一、体用互补、阴阳克谐的文化共体由此形成，文史互根的意识由此漫延。它们互为表里，相互结合，在根源上脉络相连，在精神上息息相通，成为文史合一的根之所系。

第一节 文史的同源互根

正因文史一源，先秦乃至汉代之前，文与史可谓浑然一体，彼此不分。从文字的产生来看，文与史从一开始便结下了不解之缘。许慎《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象交文。”清代段玉裁认为，文字是古代的史官仓颉根据客观事物的外在



纹理或迹象，依形画象而创造了象形文字，即“依类象形，故谓之文。”^①刘勰也说：“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②孔颖达以为：“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③总之，文字的产生，与史者、卜者之类的人有莫大的关系，故史者主文。甲骨文的“史”字，上面是放简策的容器，下面是手，合起来表示掌管文书记录。许慎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④史掌记录之职。《礼记·玉藻第十三》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曲礼上第一》又曰：“史载笔，士载言。”《周礼·天官冢宰第一》曰：“史，掌官书以赞治。”按《周礼》记载，西周时期，宫廷设置有掌管记事、文书、典籍、祭祀、星历、卜筮等职责的官吏，通称为史官，王宫之下所设置的六官之府，亦有众多的史官。惟当时的史官，非后代专职史臣，多为文书类之职官。

文字产生，乃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因此，最初的文字记录往往多具实用功能。在形式上以言事为主，或系于时间，具有早期“文史”的性质。无论是记事的甲骨文、金文，还是记言的《尚书》、《周书》，都有不同程度的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直观反映，即便是早期的文学作品《诗经》，也被打上“史诗”的烙印。汉代之前，人们更为重视《诗经》的讽喻、教化、外交辞令、知识普及等实用功能，认为孔子取《诗》三千，去其重复，留下的主要是可“备王道”的礼义伦理篇章。近代学者梁启超认为“成文”的史自史诗始。^⑤早期文字记录在突显“史”的意识功能和伦理道德功能的同时，并不反对对文采的追求，甚至以为无文不成史。春秋末期的孔子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战国后期的《韩非子·难言第三》曰：“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仪礼》亦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⑥唐代刘知几也认为：“盖史者，当时之文也。”^⑦这种自当文采斐然的观念，显然是对当时文字表述风格的概述。先秦史官深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道理，将对文辞生动的追求，看作是理所当然之事。

应该说，春秋之后，随着文献记录向史书方向的发展，文史合一的观念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为浓烈，私人著述的出现，愈发增强了记言、记事、编年各体的互相渗透与综合。史家在述史、求实、蕴义的同时，极为注重文辞表述的生动飞

第二章 史学与文史合一

①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314页。

② 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史传第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页。

③ 孔颖达撰《尚书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

④ 许慎撰《说文解字》又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第65页。

⑤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见《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91页。

⑥ 《仪礼·聘礼第八》，中华书局，1980年，第306页。

⑦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九《核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0页。

扬。《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一批作品,不仅预示着史学著述体例的渐趋完整和创新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史传文学的日渐丰富和趋向成熟。尤其是《左传》及《战国策》,语言精妙,堪称“文辞之最”,求实与夸饰并存,述史与想象同在,波澜起伏的历史场景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认知,情节描述中寄寓着隽永的哲理体悟,文史结合,水乳交融,把先秦时期文史兼融的传统推至一个新的高度。至西汉司马迁《史记》横空出世,更是把文史合一的传统推至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至高境界,司马迁亦被后世尊之为“史界太祖”。《史记》之所以备受推崇,固然缘于司马迁发凡起例,创为新体,给人们呈现出一幅上起五帝下迄汉武的长篇历史画卷,同时也是因为《史记》以其娴熟自如的写作技巧,在叙事和人物塑造方面表现出卓越而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和创造力。观《史记》为文,笔随意走,文随情发,纵横古今,出入风骚,可谓文史浑然一体,深得文史融通之法。

第二节 文史的分合交织

一、文史渐离

《史记》固然堪称文林经典,但它的问世,无疑推进了史学独立的趋势,同时为文史分野种下了萌芽的因子。尤其是司马迁标榜的“成一家之言”,使史家独立意识不断加强,史学逐渐偏离文学而趋向纯史学的发展。实际上,从《汉书》伊始,班固就有意地去除史书中的文学色彩而突出史学品格。与《史记》相比,《汉书》更注重结构体裁的规范严谨,而在文学描写及变化求神方面已然不及《史记》。《汉书》史学品格的增强与文学特点的削弱,恰恰表现了文史由合一趋向分离的萌动与开始。而官修国史《东观汉记》的编纂,无疑也促进了史学地位的节节高升,史学隐然有分离文学的趋势。文史之别一旦启动,必然引发文史的各行其道,虽然这一过程颇显复杂漫长。陈寿等史家继踵而起,顺承班固的作史之法,站在史家角度上,反对繁辞缛丽,追求文笔简洁,改描写为叙述,史书的文学色彩渐失光芒。清李慈铭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①范晔虽然笔势纵横、文采出众,但他“常耻作文

^① 李慈铭著《越漫堂日记》第二册“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广陵书社,2004年,第917页。



士”，担忧辞繁移意，“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①范晔对《后汉书》文辞的自许与其“耻作文士”的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六朝时期文史分途并进又互相影响的矛盾心理。与范晔对史书文辞的华美尚存割舍不忍之情相比，刘知几对六朝史文靡丽之风的批评可谓态度明确而深恶痛绝。他一再重申史学的“著述之力”和劝善惩恶的功能，崇尚“简要”和“直笔”，以为“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②反对文士修史，尤为不满六朝时期重“文”轻“笔”的现象，对“世重文藻，词宗丽淫”的史坛文风，提出严厉批评，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古代文史分野的发展趋势。

两汉及之后，在史学寻求独立发展的同时，文学同样探索着自我之路。客观地说，《史记》不仅引发了史家独立意识的觉醒，也同样触动了人们对文学功能的新思考。首先，《史记》本身对传记文学艺术形式的成功表现，把中国散体的叙事写人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从而为文学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及场景的描写打开了明晰而宽阔的思路，特别是其极具鲜明个性的奇思妙文，饱含着对人世间的万端感慨，曲折而深刻地传达着作者内心情感世界的波澜，无疑是对文学“抒情”之义的突显。其次，《史记》传记文学的艺术特征，虽然没有能在正史领域发扬光大，但在杂史杂传之中却得到更多地发展与延伸。从《越绝书》、《吴越春秋》、《列女传》、《西京杂记》等汉代的杂史杂传中不难看到，其文学色彩皆较经史之作更为浓郁，无论是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铺设，还是创作手法的运用、情感意志的渲染等方面，皆不乏虚构、夸张及想象之处，其艺术特点，于发轫之期的汉代小说不无积极意义，直接孕育了魏晋六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影响甚至延及至唐代的传奇小说，可以说，“汉代杂史杂传是历史文学向小说过渡的桥梁”。^③

同时，以古诗继承者自居的两汉辞赋的繁兴，对抒情性文学观念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尽管汉赋有“润色鸿业”、歌功颂德及“铺采摛文”、炫博耀奇等不足，但其中不乏抒情言志、写景咏物、劝谏讽喻的短篇小赋和散体赋。韵散结合的汉赋作为两汉 400 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形式，以其丰富的词汇、凝炼的语言、夸饰的手法、高超的技巧，引动着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中国韵文经西汉以来辞赋的繁荣，到东汉开始已出现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的意识。刘向、刘歆及《汉书·艺文志》在“经传”、“诸子”类之外专列“诗赋”一类，首先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对不同的文体进行了直接分类，文章的概念由此出现，集部形态

① 沈约撰《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830 页。

②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九《核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250 页。

③ 杨树增《中国古代文史的分合》，《齐鲁学刊》，2003 年第 6 期，第 15 页。



得以确立。

汉魏之际，汉室倾颓，经学式微，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社会无序，天下失范，必然激起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纷至沓来，玄学思潮，蔚然而起，人们的个性意识，文士的创作欲望，得以大幅度提升，加之曹氏父子的身先示范和大力倡导，文学之途由此更加开阔，终于迎来建安时期我国古代文学繁荣的春天。建安文学既是时代社会的产物，更是文学展示个体生命精神的硕果。建安文学不仅追求艺术形式的精美，情感的寄托，“风骨”的体现，同时也注重对文学艺术自身的总结和反思，从而使人们对文学的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知达到新的高度，文学由此而进入自觉的时代。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专论，曹丕的《典论·论文》足以代表建安时期文人对文学自身的反省，他肯定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高举文学凸显自身价值和意义的大旗。他所提出的“文以气为主”和“不假良史之辞”的观点，从不同层面强调了文学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个性气质以及文学受经史束缚当求独立的时代精神。他的四科八体说第一次对各种文体的分类、特点、风格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他的“诗赋欲丽”的思想，已突破儒家“诗言志”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纯文艺观的萌芽。总之，《典论·论文》对文学主客体诸方面的评论与反思，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的时代特征，也是文学意识趋向自我觉醒的深刻表现，文学的独立性首次得到文学界和时人的认同。

如果说，《典论·论文》重点在理论上对文体的类别和风格特征进行了概述，那么，南朝梁萧统的《文选》则在选文文本中对以往作品的文体进行了划分与著录。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通代文学总集，萧统《文选》选录的标准，强调文学的形式要具有“骈化”之美，把文学与经、史、诸子以及一般应用性言辞划清开来，文学的艺术性与审美观念更趋明晰。萧统《文选序》曰：“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即将记事写人为主的史文，无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一律排斥在文学大门之外，仅收录史著中具有文采的论赞序。同时指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文选》对记事系年史书的排斥，明显地表现出文史分家的倾向。可以说，《典论·论文》、《文赋》、《翰林论》、《文章缘起》、《文心雕龙》、《文选》、《颜氏家训·文章》的相续而出，正是文学至此而独立的史书映证。

二、文史两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皆摆脱经学的禁锢而开始独立。大体说来，晋代经、史分离，南朝文、史分离。文献记载：魏明帝太和(227—233)年中，设置著作郎，



这是我国历史上专司著史之官设置的最早记录。史独立为学，最早是在十六国后赵石勒元年（319），《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载：“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睿为史学祭酒。”史与经、律并立为学，“史学”一词，首次出现，经、史由此分离。南朝宋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并建儒、玄、史、文四学，^①作为培养、选拔和任用官吏的机构。至此，标志着在学术分化的大趋势下文与史的区别终于明确，也促成了萧统以专收文学作品为宗旨的《文选》这一文学范本的出现。虽然当时的所谓“文学”、“史学”与今天所说的含义不能完全等同，但文与史的划分与区别已得到官方及民间的认同，则是毫无疑问的。当代学者谢保成认为：“通常以为史学与经学分离后即告独立，如果把标准定得再苛刻些，或许可以说，只有到史学与文学也划清界限后，史学才真正获得了独立。”^②

图书目录的分类情况也大体可以验证这一点。东汉班固承刘歆《七略》之例而创《艺文志》，著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史书录在“春秋家”，归属六艺略，尚无史部的分类。魏晋之际，图书分类发生重大变化，晋荀勖《中经新簿》首先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史学被列入丙部，从此史学在目录学中开始有了单独的地位，并占据第三的位置。诗赋被列入丁部，虽说尚不能完全相当于后来的集部，但亦单独列为一部，位居第四。东晋初李充整理图书，又重新排列四部的顺序：“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③史书跃置第二位，李充的这种分类法符合当时学术文化发展的大势，很快得到了官私目录的承认，“世相祖述”，无所变革。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四部分类法，还是七种分类法，都将文、史分而著录，如梁阮孝绪《七录》，分为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佛录、道录，前四录实际上也是经、史、子、集的排列次序。唐初开馆修史，《隋书·经籍志》以官方名义第一次正式用经、史、子、集概括各部类书籍的性质、内容，文、史独立门类，自此明定，而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主导地位也一直沿袭至清。

三、分而不离

文史各为门类，文史有别，已然得到社会的认同，但这并不代表文史各自一方，互不相关。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文史学家并无明显区别，他们也从不在实践

① 沈约撰《宋书》卷93《隐逸·雷次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93页。

② 谢保成著《中国史学史》（一），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62页。

③ 《文选》卷四十六《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75页。



中把文史截然分开。文史的同源性,使他们在作品的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把文史结合在一起,文史处于分而不离的状态。公元五世纪初诞生的《文心雕龙》,可谓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理论专著,在全面论述文学要义的同时,作者刘勰并未强调文史的区别,而是将文史贯通起来,把经史辞章等各类文体都放置于广义的“文章”视域中进行考察,显示了较《典论》、《文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其实,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处在高呼文史分离而又难以骤然分开的状态中。即使至唐代刘知几以崇史贬文的姿态号称“文史异辙”,却依然摆脱不了实践中的文史不分,一部《史通》,名属论史,实则处处不离论文。对于叙事行文,刘知几力主简要为工,倡导真、朴、今之文,但《史通》却处处可见骈体之迹,文采毕现;对于史著优劣的比较,文学性的强弱、语言的生动,依然是他评判史著高低的重要标准;对于史书体例的划分,刘知几有着明确的类例意识,但他还是把许多有文学色彩的杂记、小说划于史部之中。由此可见,文史的分离谈何容易,同时也再次证明了文史互为依存的亲密关系。

同样,在唐宋众多文史学者及作品中,依然呈现着文史分而不离的景象。诗是唐代文学的代表,诗是唯美而浪漫的,也是现实而社会的,唐诗以从未有过的广阔深入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尤其是杜甫、张籍、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作品,“篇篇无空文,惟歌生民病”,堪称“诗史”,诗与史的结合从而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唐宋的散文尤其是政论文中,文史的融合更为明显,古文运动的推进使经史哲学都成为文学正统,一篇篇明道、载道之文把历史、政治与文学高度结合起来,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柳宗元的《与韩愈论史官书》、《封建论》,苏洵的《管仲论》,苏辙的《六国论》、《三国论》,欧阳修的《朋党论》、《伶官传序》,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曾巩的《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等,无不具有文史结合、古今相鉴的特点。我们无法否认,浓烈的历史情感、历史意识总是时时地从那些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诗人作家的笔中流露出来,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兴衰转变和文化沉淀,已成为一代代文学创作者无法舍去也不愿舍去的宝藏,他们总是情不自禁地从文学、诗歌、艺术的领域跨入史学天地或历史领域,寻找着文史所共有的意义与价值。

虽说唐宋以后史学著作,在与文学联系的结合度上远远不及文学作品,但优秀的史家或史书仍然保持着文史兼融的传统,司马光的《通鉴》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通鉴》一书,以编年形式陈述了从三家分晋到后周世宗约 1300 多年间的中国历史,本来极为枯燥的编年叙事在司马光的笔下却精彩纷呈,除却体例上的灵活调适之外,更明显的是司马光文学叙事方法的充分运用。毛泽东自称十七次批注过《通鉴》,他对《通鉴》的叙事生动赞不绝口:“《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



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纵观《通鉴》全书，文史结合，浑然一体，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有熔铸百家之功，得深入浅出之妙。《通鉴》虽然带有政治家释史的色彩，但依然不愧为一部杰出的文学名著。吴缜在史书评论中认为史的要义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①坚持事实为根本、文采以行史的文史兼具的观念。文史学者曾巩也认为“良史”应具备“明理”、“道用”、“智意”、“文情”^②四者兼备的素养，这些主张都表明了当时的史家对文史相互结合的重视。

明清时代，文史作品琳琅满目，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繁荣，在某种意义上使文史的结合推至一个更广阔的境地。而大部分史学著作走向所谓“纯史学”的研究路径，注重史事的编排用例与考证辨误，少数具有批判精神的史家则愈来愈强调史学经世致用的社会意义，虽然不时也会出现一些具有特色的史学名著，但文史俱佳的史著却日渐稀少。不过，章学诚《文史通义》对文史的兼论，还是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史家对文史结合的重视和灼见。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不仅从“六经皆史”的角度把文史归于一体，而且从“经世致用”的高度上揭示了文史创作的共同目标。章学诚固然以追求史意、考镜学术源流为己任，但他并没有忽视对文学尤其是对历史文学的评议，他在《又与朱少白书》中说：“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③可见他对文辞达意是颇为看重的。他在《史德》、《文德》、《文理》、《文集》等篇中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史学与文学的可通之义，主张“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反对空疏浮夸之文，大有“文质则史”的味道。其《史德》篇曰：“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④又曰“良史莫不工文”。显然，史义、史事、史文三者的结合，已成为《文史通义》论述的核心要义。章学诚特别重视著述者的品格素养，认为心术平正者才能写出“气昌而情挚”的天下至文，从而把情感、气量与品格、心境联系在一起，对文史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之，章学诚文史并重、文史须与心术结合的思想，为古代文史有别而不可分离作了又一次明朗而重要的注脚。

① 吴缜撰《新唐书纠谬·序》，四部丛刊本。

② 曾巩撰《南齐书目录序》，见张伯行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5页。

③ 章学诚著《与朱少白书》，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九，文物出版社，1982年重印嘉业堂刻本。

④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史德》，中华书局，1985年，第219页。



第三节 文史的现代分科

我国古代的文、史分类虽然早自南北朝时期即已开始,但文、史划分在理论上的体系并未建立,文、史之间的界限也不明确,现代意义上学科体制的建立源自于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之后的学科分类思想。近代西方的工业革命,直接导致了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也必然推进了知识的分化,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理学、工学、教育学等九大学科概念应运而生。从此,文学和史学各自独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而走上了一条不断更新调整且高度细化的途径。时至今日,在人类知识总量的巨大增长和不断积累下,文、史学科的体系结构日益复杂,学科分化日益明显,分支学科、边缘学科、新兴学科越来越多,按照我国现代学科划分方法,历史学下属3个一级学科,15个二级学科,若干三级学科;文学下属4个一级学科、29个二级学科,若干三级学科。学科的高度细化,表明了文、史两科在知识建制上大步拓展,表现了学科认识视野的不断开阔,研究领域的渐趋深入,认识模式的具体微观化,这种发展变化与进步趋势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预示着古老的人文学科在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的重大变革,其中既有光明的前景,但也无可避免地隐藏着一些忧患,存在着令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文史分科独立不是文史分家,但现实情况却存在大量文史两科相互分离的观念和行为。文者不知史,史学远离文,文史各行其道,学科之间逐渐形成了有形无形但却巨大的鸿沟高墙,学科及专业之间的交流与渗透被严重忽视,教师队伍中存在不愿甚或是不能开设跨专业课程的现象,更少有人去了解和研究文、史两科的关系及差异与共性所在,种种现象虽属个人行为,但其普遍性的存在说明在观念上的非自觉认知和行为上的不作为。文史不相知、文史相分离,虽然不是直接由文史分科引起,却与强化文史分科及文史内部的分化有着莫大的关系,愈来愈细的文史分支学科的划分在体制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局限。现今的文、史两科,涵盖四、五十个二级学科,涉及二、三百个专业,存在着过度专业化的倾向,块垒繁多,教学科研格局日见其小。文史各科、各专业画地为牢,专业化、职业化趋势日见加深。不少专家只是某个狭窄领域作局部研究的“工匠式”职业人,在自闭有限的空间耕耘着一亩三分地,表面上看是专业高手,实际上已成畸形偏科之才,他们沉沦于所谓的专门领域中而不能自拔,对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或相关专业,已渐无兴趣,既无责任去多管“闲事”,也无精力旁涉许多,



搞中国史的不再关注世界史,搞文学的不知史学现状,此类情景绝非个别,人文科学那内在整体会通的学术精神和博大深邃的情怀与理想,已在专业化和功利化的不断削磨之中渐渐地消退并迷失。如此状态之下,社会只能产生大量的“一专”之家,而难以产生“全才”的学者,更不要说出现能在人文科学世界领域自由漫步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学者”和学贯天地、才气磅礴、胸境高远的“学术大师”了。同时,分门另类的学科与专业早已成为当今高等教育课程的基本构成要素,各科教师只需按部就班地讲授本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学生也多以单纯的知识学习或专门技能的训练为目的,忙碌于各种职业资格证书的应试考级之中,学术人才的培养变成批量生产单一产品的流水线,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学术旨趣与情感空间,越来越被这种学科界限、专业规则、职业趋向所束缚。学历走向高文凭,学业趋向专门化和职业化,而学术精神与情感世界却因为人为的细化与分割而支离破碎,并从而偏离了它的总体文化精神与本真属性。

文、史两科分立及学科的分化,固然为近代科学发展的一大突出特点,但切忌以科学二字自划牢笼,人为地营造偏科或分科的狭隘观念,更不可在学术视野中形成独见一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惯性。文史自古一体,本根相连,虽经“自然科学化”改造而各自形成庞大复杂的学科结构和条分缕析的分科体系,但其人文本质依旧,学术精神并未完全剥离,文史分家,还是“还家”,已成为我们面临着的艰难抉择。现代人文科学的倡导和兴起,未尝不是对学科划分过于专业化和学校教育过于职业化的一种修正。

20世纪初期几乎同时出现在美国很多知名大学中的“通识教育”,就是针对教育过度专业化、职业化或市场化的问题而流行的一种教育观念和课程模式。哈佛大学专题报告《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指出:“单纯的知识学习或专门技能的训练,都不能使学生理解我们的文明得以源远流长的广阔基础是什么。没有人想要贬损‘见多识广’的重要性,但是,即使在数学、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又有能力用几种外语读书和写作,仍然不能说可以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提供一种足够有效的教育背景。因为这样的项目与作为个体的情感体验以及他作为群居动物的实践经验都缺乏联系。……这样的项目中没有历史,没有艺术,没有文化,没有哲学。除非在学生的第一个成长阶段,教育都与价值判断在其中具有优先意义的那些领域保持某种持续的联系,否则必定不可能实现通识教育的理想。”^①其实,通识教育在强调知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同时,

^① 哈佛大学专题报告《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转自朱红文主编《人文社会科学导论》导言,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



更注重学生人格和知识的内在统一，“通识教育的核心是对自由和人文传统的继承”。因此，今日的教育，不仅仅在于知识和文化空间的拓展，更在于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在于知识能力与价值判断能力的统一，注重在知识与学科的对话和统一之中重现心智和思想的灵性。融通文史，打破学科与专业块垒的坚壁，视人文学科为一体，保持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有利于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思考和把握对人类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最基本的普遍问题的理解，实现由单一学科教育模式向多科融合教育模式的推进，培养出不仅具有广博的人文知识同时也对人文精神理想有深切体会的现代人文学术人才。